

越文化研究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特色栏目论文选

会稽士族、 家族与士绅社会

KUAIJI SHIZU JIAZU YU SHISHEN SHEHUI



高利华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越文化研究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特色栏目论文选

会稽士族、 家族与士绅社会

KUAIJI SHIZU JIAZU YU SHISHEN SHEHUI



高利华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会稽土族、家族与士绅社会/高利华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 - 7 - 5203 - 3921 - 6

I. ①会… II. ①高… III. ①士—群体—研究—华东地区—古代
②家族—研究—华东地区—古代③士绅—研究—华东地区—古代
IV. ①D691. 7②K8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025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陈璐暘
责任校对 王 龙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282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六朝会稽士族文化研究

越文化与东晋士风文风	渠晓云 (3)
论会稽士族与孙吴政权之关系	吴从祥 (15)
两晋南朝时期的会稽郡孔氏	张宏璞 (26)
会稽大族与两晋士族政治探析	姚培锋 (34)
浅析会稽郡在东晋南朝民风变迁之因	朱 帅 (51)
略论东晋南朝会稽文人群	袁金祥 (67)
云门寺与王氏书法之传承	陈 静 (77)
陈郡谢氏在东晋时期的影响	曹瑞珍 (87)
六朝会稽虞氏家族述略	吴建伟 (100)
中古会稽士族的学术著述及贡献	渠晓云 (114)

宋明时期文化家族研究

宋代越地的文化家族

- 以明州鄞县史氏和越州山阴陆氏为中心 高利华 (141)
- “家风”与陆游的诗歌书写 郭玉琼 李金松 (158)
- 宋元时期绍兴地区文人群体的教育活动 王遥江 陈国灿 (170)
- 王阳明家族流源新说 顾旭明 (181)
- 王阳明的家世及古文献学思想 戴晓红 (192)
- 徐渭与越外、越中曲家的交往及其对后学曲家的影响 余德余 (202)
- 感恩与怜才：徐渭与张岱家族关系考 汪永祥 (223)
- 藏书世家山阴祁氏家风及其地域传承 许经纬 (234)

晚近士绅社会研究

- 辛亥前后的浙东士绅与兴学活动 蔡彦 胡军军 (247)
- 绍兴先贤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 林文彪 (261)
- 蔡元培与近代绍兴人才群 苏莉莉 徐嘉恩 (269)
- “老中国”形象的空间与场域展示
- 越文化空间中的鲁迅小说“场域设置” 黄健 (285)
- 鲁迅：越“名士文化”之个案分析 陈越 (299)
- 近代旅沪绍兴帮钱庄研究 陶水木 (312)
- 清末民初绍兴商业合伙形态研究 颜志 (328)

六朝会稽士族文化研究

越文化与东晋士风文风*

渠晓云**

摘 要：东晋士风文风表现出闲淡自然的形态，与西晋的士风文风完全不同。论者以为这种闲淡自然固然与玄学的影响、东晋门阀政治密切相关，但与其产生的地域会稽不无关联，可以说它表现了越文化的另一面。

关键词：东晋士风文风；闲淡自然；越文化

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一个社会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但是这样的概念太过宽泛而失去了它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然而，无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给文化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以至威廉斯认为文化是英语中两三个最为难解的词之一^①。文化的多义性逐渐被人们认识，任何一个普遍性的定义都不可能涵盖文化所有的内涵。不同的语境如民族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5年浙江省教育厅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050029）。

** 渠晓云（1974—），女，山西临县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① [英]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1页。

通俗文化等，强调的是文化的不同侧面。因此，在文化研究中，首要的任务是厘清文化所处的学术语境，并进一步确定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 越文化的研究取向及其意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文学科出现了文化转向，文化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各种学科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等，纷纷与文化发生关系，从而使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彩的局面。那么，越文化研究作为地域文化研究，应该有什么样的取向？越文化不可能囊括文化研究的所有内容，它必然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论者以为，越文化应将目光主要放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建立民族志的方式来建地方志，深入田野作业，考察越地“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①，以及现存的民风民俗、具有文化内涵的地名等。格尔兹认为，“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②。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抽象的分析就是在进行文化阐释。文化在格尔兹看来就是人自己编织并悬挂于其中的意义之网^③。对越地上述资源的文化阐释即构成了越文化研究的第一个主要内容。

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在这一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例如，日本著名学者木山英雄对于绍兴堕民的传说、堕民生活的三埭街的地理位置、建筑乃

① [英]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 页。

② [美] 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 页。

③ 同上书，第 5 页。

至风水进行了考证与研究^①；梁涌对绍兴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考察，研究了绍兴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提出了“生活中的越文化的张力”的命题^②；侯友兰与徐阳春对绍兴的地名文化进行了梳理，他们从绍兴地名的语言特点、文化因素、文化内涵三个方面对地名进行了考察^③。这些研究为越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打开了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

第二，对越地传统文化的挖掘和研究，包括越地传统（古代、近现代）文学研究、艺术研究等。在揭示越文化为中华文明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体察越地的精神特质与人文传统。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对传统持有虚无主义的态度。近现代以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从西方汹涌而来，现代中国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来自西方。传统与现代被割裂。传统的失落使我们在无根地漂泊，从而导致了蔓延在社会各个层次的精神危机。寻找失落的传统刻不容缓。传统需要记忆，需要保存，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④ 我们应该从目前的生活情境出发积极展开与传统的对话，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自我，在历史存在中发现自我。

越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整个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越文化的考察，首先要辨别其与其他地

① [日] 木山英雄：《绍兴“三埭街”——历史与传说》，《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90页。

② 梁涌：《生活中的越文化张力略论》，费君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350页。

③ 侯友兰、徐阳春：《绍兴地名文化初探》，费君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317页。

④ [德]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域文化的差异性。差异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丰富，而且展现了文化的不同表现方式。只有在具有特殊性的个体之间的对话，才能够真正向着普遍性行进。越文化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本文将目光聚焦于越文化的传统发掘，致力于东晋士人与越文化的特殊关系，以及越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 越文化的另面

越人历来以尚武、多疑、耿直等鲜明的个性著称。张兵用12个字来概括越文化的特征：“尚武爱国，创新进取，奉献自强。”^①这种刚烈豪侠之气流淌在一代代越人的血液中，尤其在保家卫国的斗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越女试剑的故事到爱国诗人陆游，再到人称“鉴湖女侠”的秋瑾，以及被毛泽东称为“骨头最硬”“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鲁迅，尚武爱国之气生生不息。陈伯海认为这种“略具原始性的质朴、生猛的气质却长期存留下来，积淀于越文化传统的演进之中”。这一特质与中原华夏文明重礼教、尚文饰的特征有明显的区别。这种特质表现在喜生食、重巫鬼等的民俗中，也表现在泼辣大胆的明清山歌、高腔亢厉的绍剧等文化现象中^②。

古越人缘何会表现出如此好勇尚斗的性格？顾琅川认为越文化的精神个性与地域的环境条件有密切的关系。越地滨江临海，多草泽丘陵，山洪潮汐、虫蛇野兽相继侵袭为害。《汉书·地理志》记载：越人“文身断发，

① [德]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② 陈伯海：《越文化三问》，费君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2页。

以避蛟龙之害”^①。古越国人口稀少，环境恶劣，生产方式、生活水准远远落后于中原之地。生存的艰辛是古越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内忧之外，又有外患，北部强大的吴国威胁着越国的生存，使之处于种族覆亡的边缘。这种严峻的现实磨砺了古越人的性格，形成“一种强悍、峻烈而轻死的蛮风”^②。古越人的性格特质深深影响了越文化的形成与形态。

但是，文化精神从来不会是单向度的，文化的丰富正在于它的多样性。在越人上述文化性格的背后，还有一种人们不太注意的文化特性，那就是东晋南迁士族带来的闲淡自然。潘承玉认为越文化的创造主体并不是单一的。他将越文化的主体分为五类：“生于斯终老于斯的越地土著，生于斯却出外谋求发展以至终老不归的越地游子，生于外地但父祖籍贯在越地的越地后裔，由外地迁居于斯的越地新居民及其子孙和暂寓于斯的越地过客。”^③ 这些越文化的主体都在越文化的形成中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如果说生于斯长于斯的越人先民开创了越文化，那么越文化的保鲜与发展有赖于其他文化的汇入与融合。只有获得新鲜的血液，文化才会有创造力。越文化是一条奔腾的大河，与其他文化的交融就好像支流不断汇入。

东晋南迁士族正属于“由外地迁居于斯的越地新居民及其子孙”一类。西晋末年，战乱频生，外族入侵，大量士族纷纷南下，其中一大部分就来到了风景秀美的越地。他们的到来给越文化带来了不同于传统古越文化的因子，开创了与古越尚勇好斗的文化特性截然不同的文化面貌，构成了不同于主流越文化的另面。寓情于自然山水之中，东晋士人不仅改变了西晋的士风文风，也为越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正是这些另面文化丰富了越文化，使越文化呈现出立体化、多维化的态势。

①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69页。

② 顾琅川：《古越文化精神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③ 潘承玉：《越文化研究纲要》，《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三 东晋士风文风的转变与会稽佳山水

东晋的士风文风与西晋不同。西晋士人无特操，追逐名利，他们的生活日益苍白，感情日益无力，文学上只有在辞藻排偶上用力；东晋士人则追求闲淡，无意功名，文学上或表现为枯淡或呈现出清新自然。

那么，东晋士风文风的转变原因何在？论者以为，这种变化与玄学有密切的关联。玄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文学中直接探讨玄理，从而使作品形成质朴枯淡的风格。这类文学是东晋的主流文学，后世对东晋文学的批判也主要是针对此而言。刘勰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违遭，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① 沈约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词，义殫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义玄珠，遁丽之词，无闻焉尔。”^② 沈约指出东晋文学表现的内容是“寄言上德，托义玄珠”，而文风上则失去了遁丽的风格。遁，代表着魏代文学的风骨；丽，是西晋文学的主要风格。东晋文学将二者都抛掉，走向了质朴枯淡的风格。二是玄学的发展使东晋士人的审美情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既无建安士人建不世功业的大志，也无正始士人的愤激，更鄙视西晋士人的追名逐利，他们崇尚的是淡。正如王锺陵先生所说：“东晋一代的审美情趣，可以用‘玄淡’二字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5页。

②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

加以概括，而其核心则为‘淡’。”^①

这种转变还受到东晋特殊的政治环境的影响。门阀政治使士族在政治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庄园经济的发展使士族在经济上无忧。门阀政治和庄园经济为士族在生活上提供了充分的自由。东晋士人既无须考虑物质的需要，功名富贵又唾手可得，于是他们便转向精神，重视情性。

还有一点，这种变化与会稽山水有关。这正是本文重点论述的内容。

东晋士人既重性情，便喜在山水游弋中体悟人生。尤其要注意的是，东晋士人所处的山水是江南的秀丽山水，在这种宁静秀美的自然山水的陶冶之下，他们的审美情趣、理性人格发生剧烈转变。东晋士人追求一种旷淡的理想人格，“无论是旷淡，还是简淡，都是门阀士族具有浓厚玄学色彩的理想人格”^②。东晋士人热爱山水，崇尚自然，对文学语言形式的要求也以自然为尚。所以，比起西晋文学来，东晋文学要质朴得多，形成了一种淡远清新的风格。东晋的文学理论不多，我们从李充《翰林论》中可以窥探其一二。《翰林论》现在只留下了残缺的几条，如“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校不以华藻为先”“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③。李充是东晋初期之人，他的文学观念已经不是西晋尚丽的观念。其论中多次提到的“远大”，是指对文学意境的开拓。文学从魏代的动情与气骨，发展到西晋的繁丽；到东晋崇尚“远大”，总体文风表现为一种淡。

相对安定的环境对于文艺的发展是有利的，门阀士族为了维护家族的特殊地位，也特别重视文艺，所以东晋的书法、绘画等艺术都达到了很高

① 王锺陵：《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97页。

② 同上书，第501页。

③ 李充：《翰林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67页。

的水平。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第一流的。这些个人的修养如书法、绘画、音乐，同玄谈、文学一样是东晋士族身份的象征与显示。

身处江南的秀美山水，东晋士人重视在山水中陶冶情性。东晋社会，从帝王到僧人都在自然山水中追求一种会心。简文帝司马昱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① 山水在他们的眼中是一种独立的存在，王徽之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② 顾恺之说，会稽山川“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③。东晋士人认为山水自然中隐藏着宇宙、人生的真理。因此，士人经常出入于山水，王羲之、谢安、许询、支遁等名士名僧，“出则鱼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④。如果说竹林名士的放诞出于愤激，中朝名士则真的以纵欲为尚，那么东晋名士则转向为对个人修养的追求、转向山水之乐。

王羲之是东晋士风文风转变的典型。他归隐之后与东土（宁绍平原）人士尽山水之游，“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⑤。在山水中，王羲之寻到了人生的乐趣。山水一直是王羲之生活的重要部分，他喜爱山水、崇尚山水。当时的会稽郡有佳山水，名士谢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士人用心去亲近山水，在山水中体悟玄理，将山水作为颐养身心之所。戴逵曰：“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

① 徐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7页。

② 同上书，第82页。

③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04页。

④ 同上书，第2072页。

⑤ 同上书，第2101页。

避争斗。谅所以翼顺资和，剔除机心，容养淳淑而自适者尔。况物莫不以适者为得，以足为至。彼闲游者，奚往而不适，奚待而不足！故荫映岩流之际，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则澹泊之愿，于是毕矣。”^①既然山水有这样重要的作用，士人就越发的喜游山水。

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召集同好在会稽山阴兰亭宴集。王羲之召集的这次三月三日的聚会，是一次盛大的集会，共有42人参加。这次集会共辑诗37首，王羲之既然是召集者，诗集序就由他来写。这就是他的散文名篇《兰亭诗序》。这样盛大的宴集在西晋也有过一次，石崇等30人为送王诩还长安，共往金谷涧中，昼夜游宴，在石崇的别业举行金谷诗会，石崇曾作《金谷诗序》。时人将王羲之《兰亭诗序》与之相比。

石崇引以为豪的金谷别业，“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至”，又有水碓、鱼池、土窟，所谓“娱目欢心之物备矣”。众人“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在石崇等人的眼中，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水碓、鱼池、土窟等山水自然还只是各自孤立的“娱目欢心之物”^②，山水只是外在于人、让人娱乐的“物”。

兰亭集会中自然山水则显示了很大的不同。《兰亭诗序》开篇王羲之即点出聚会的时间和事由：“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③石崇《金谷诗序》列举了若干可以“娱目欢心”的自然之物后，便将山水抛之脑后，开始了热闹的诗会。王羲之对兰亭诗会的描述则完全不同，自然与诗会是相互交融的。在“群贤毕至，少

① 戴逵：《闲游赞序》，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50页。

② 同上书，第1651页。

③ 王羲之：《兰亭诗序》，《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99页。

长咸集”之后，他开始关注山水：“崇山峻岭”是人所处场所，“茂林修竹”与“清流急湍”是人周围环境，“映带左右”象征着人与自然的无言融合。环境交之后才是诗会的过程：“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同时，描述诗会的过程中时刻不忘自然：“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在这一段中，王羲之将诗会的过程与山水的描写始终结合在一起，此种安排富有深意。在这里自然不再是“娱目欢心”的对象，而是诗会中不可或缺、激发人思维和灵感的源泉，是诗人欢畅于其中，并与之对话、与之交融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人是自然的一个因子，人在其中领悟了生存的真谛。在山水中悟道并乐在其中，对于王羲之及其诗友来说是人生乐事。

王羲之对自己闲适的隐居生活甚为得意。他可以在家中教养子孙享受天伦之乐：“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衣食之余，与亲人知交时共欢言燕，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饮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①。王羲之追求从容闲适，他本身又“一往隽气”^②。他的这种气质表现在散文中形成了自然隽永的风格。这种文风正是东晋士人追求萧散的意趣、崇尚从容闲适的生活在文学中的反映。

孙绰是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作家，他也善于在山水中悟道，认为山水是写作的源泉。《世说新语·赏誉》：“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坐在坐。孙曰：‘此子神情不关山水，而能作文。’”^③在孙绰的眼中

① 王羲之：《与吏部郎谢万书》，《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02页。

② 徐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1页。

③ 同上书，第261页。